

論 点 摘 編

中国美学史研究：限界、可能与目标

刘成纪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在中国现行的美学学科框架内,中国美学史可能是最让人无法以个人之力穷极的领域。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传统美学资源本身的体量庞大和浩瀚,另一方面则由于现有美学理论和时代精神均对它缺乏持续性的约束力。但是,这种理论和时代的“双失”却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不断开出新境的必要条件。就美学理论与美学史的交互关系看,中国美学史既接受理论给予的限定,又以本土经验重建学术视域,并通向美的普遍历史;就美学与时代精神的关联看,这一领域既映显现实,又表现出种种偏至,但这种偏至正预示了美学史研究的全新可能。可以认为,在现代学术视域内,美学学科无论是它理论的弹性、思维方式的一般性,还是研究对象的无限广延,均意味着它是对人和世界普遍存在性状的描述,并不仅限于一种专门的知识。由这种理论和学科性质建构的历史,则必然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普遍视野。于此,一切历史都是美学史。

城乡中国时代的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周立等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中国已进入城乡中国时代,讨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问题,必须具备城乡互动视野。长期的去组织化,使得乡村无法抓住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带来的机会,反而加速乡村各生产要素流出。再组织化是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推动乡村创造新供给、满足城市新需求,促使城乡发展再平衡的重要前提。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外部结构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新机遇,为村庄再组织化提供必要性;村庄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行动者交织互动,为村庄再组织化提供可能性。“中心人物-关键群体-后

续参与者”相继将创造乡村新供给的设想付诸实践,促成城乡互为供求、有序互动的融合。乡土中国时代以“以土为生”的均质化小农,在城乡中国时代以高度异质化特征出现,并将形成有别于一般农民合作社均质化假定的新的集体行动结构。对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进行利用和升级,可以推动形成基于市场规则和乡土人情相互融合的城乡中国时代的新村庄社会结构。异质化的个体行动者与村庄社会结构的不断交织互动,能够推动村庄再组织化不断迭代升级,促成城乡中国时代的供求匹配,实现城乡发展再平衡,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基本经验

孟宪平等在《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核心,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主要包括:积极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运动、始终强调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坚持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延安实践为新时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涵养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在灵魂、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力量之源。

中国革命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与统一战线

薛庆超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统一战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创新。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时期酝酿、形成,并不断发展深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创建民主的联合战线,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战胜强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赢得革命胜利。历史证明,能否正确认识、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直接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深入研究中国革命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丰富经验,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长远的现实意义。

走向实践的文化:唯物史观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路向峰等在《社会科学研究》2022年第5期撰文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重新审视文化及其表现形态,理应把文化的实践形态合理地理解为人类社会有机体中人类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进程中创造的文化产品和形成精神成果的对象化活动,进而在观念形态文化和实践形态文化的辩证统一中直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在理论上阐明文化实践何以成立,文化实践的内涵为何,文化实践都有哪些表现形式,文化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关系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把文化合理地理解为作为观念形态的结果和作为实践形态的过程的辩证矛盾统一过程,不仅能够以实践整合文化资源,还原文化发展的真相,而且在理论逻辑上能够以实践消弭文化理论偏差,揭示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能够用实践创新文化的理论原则,重释文化的实践意蕴。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文化道路砥砺前行,不断在问题中的哲学和哲学中的问题互动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地由自发走向自觉,达至自信。

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四重维度

郑玉尚在《领导科学》2022年第10期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领导力是党把其价值理念、历史使命和战略目标植根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各项制度之中,基于不同领域的发展规律执行因地制宜的领导策略,并通过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予以落实,在实现党的执政目标中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能力。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价值之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现实之维,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路径之维,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的保障之维。这四重维度的特征使得中国共产党制度领导力降低了运作过程中的模糊性,能有力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性,保持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高度认同感。

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杨群红在《中州学刊》2022年第8期撰文指出,当今时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我国农村经济社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在政治方面,党在农村的领导体制由过去的社区(村)“两委”分设向今天的全面推行“一肩挑”转变,党在农村的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转变;在经济方面,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由过去的以依靠农业种植、养殖为主向今天的以进城务工创业取得经济收入为主转变,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经济工作的任务由过去的以贯彻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向今天的推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转变;在社会方面,农村人口结构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农村居民利益诉求由过去的增加经济收入为主向利益诉求多样化转变。这些新变化给新型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了新挑战。应对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必须加强组织体系建设,构建社区党组织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组织体系;抓好干部、党员、人才“三支”队伍建设,为做好社区党组织建设工作奠定基础;加强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建设,保障“一肩挑”领导体制下的社区党组织权力规范运行。

新时代党政联合行文之法律性质的认定标准研究

赵晓毅在《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撰文指

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管党治国的实践中,基于党的领导地位,党的机关和行政机关往往采取“联合行文”的方式实现既定的治理目标,从而产生了诸多“党政联合行文”。进入新时代,伴随着党的全面领导的加强,党政联合行文现象愈发普遍,且逐渐彰显出无可替代的制度优势和独特治理效能。党政联合行文在实践中遭遇的困境,源于对其法律性质的认识不清,并由此引发了理论上的争议。为准确认定党政联合行文的法律性质,需要构建起双层梯级的认定标准体系,即首先通过“具体与抽象”的“一级认定标准”将党政联合行文区分为“具体型党政联合行文”和“抽象型党政联合行文”,由此将“具体型党政联合行文”认定为体现“党的意志”的具体行政决定。而对于“抽象型党政联合行文”,需要通过“形式与实质”的“二级认定标准”进行再次判断,从而精准认定一个党政联合行文的具体法律属性。

新冠疫情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回应

侯宇等在《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9月13日(网络首发)撰文指出,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行政机关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获得了在法理基础方面和法律规范方面的正当性。有权力难免会有侵害,疫情防控期间,行政机关利用职权便利处理个人信息的同时也对公民权利造成了侵害,因此在民法刑法保护的局限性、行政机关的专业高效性以及现代行政法治对权力控制的价值追求的背景下,要求行政机关承担保护个人信息的消极不侵犯以及积极保护的责任显得十分必要,具体来说行政机关应当受到法律保留、最少必要、安全保障等行政法原则的规制,通过对“限制的限定”,来实现个人信息在行政法领域得到充分保护的自的。

无手机恐惧: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手机分离

衡书鹏在《心理发展与教育》2022年8月23日(网络首发)撰文指出,无手机恐惧是一种由手机不在身边或无法使用手机所诱发的情境性焦虑。近年来,大量研究证实了无手机恐惧的普遍存在。相关

理论从错失恐惧、手机依恋和自我扩展等视角解释了无手机恐惧发生的原因。综述以往的实证研究发现,无手机恐惧的发生会受到个体特征(人口学变量、人格特质等)和手机使用行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无手机恐惧会对个体的认知与学业表现、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压力感、心理健康、生活方式和睡眠等多方面产生消极影响。未来研究应厘清和完善无手机恐惧的结构与测量工具,拓展无手机恐惧的研究方法与手段,进一步探讨无手机恐惧的影响因素、后效及作用机制,并加强对无手机恐惧的干预研究。

算法在国际政治中的“非中性”作用

张涛等在《国际论坛》2022年第5期撰文指出,算法技术具有和任何技术工具一样的中性特征。但是,算法一旦被国家行为体使用,就成为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追求权力和利益的国际政治工具,也就具有了“非中性”作用。“技术嵌入”和“权力赋能”是算法产生“非中性”作用的两条路径。“技术嵌入”即算法嵌入信息流通体系加剧全球信息生产和获取的不对称性;“权力赋能”即算法通过赋能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增强国家综合国力,这种赋能的不对称性为算法强国谋取国际政治利益提供了现实可能。算法在国际政治中的“非中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外政治渗透,即算法技术强国利用算法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对他国实施政治干预和观念渗透;二是军事力量转移,即算法军事力量赋能的国际差异不断扩大国家间军事实力的“非对称性”;三是经济利益获取,即算法通过变革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扩大国际发展鸿沟。算法“非中性”作用的实质是国家间的权力较量、安全博弈和利益争斗。未来,国家需高度重视算法的战略价值,推动算法技术在关键领域的深度应用,利用其提升国家安全治理能力,以维系和拓展国家利益。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的逻辑考察、动能分析及提升路径

高中建等在《湖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作为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主流意识形态具有

引领功能,引领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所生产的思想内容得以有效分配,这一行动的当代指向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上达到统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源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生成的本源性能、舆论宣传施加的引导性动能以及体制机制提供的运行性能。基于力学原理,为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在力的方向上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社会发展方向,强化本源性能的阐释力;在力的大小上要发挥党员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增强引导性动能的牵引力;在力的作用点上要推动话语体系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优化引导性动能的亲和力;同时还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体制机制保障,确保运行性能的持久力,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行稳致远。

社会企业精神是优秀企业的锐意求进旨向

金碚在《经济研究参考》2022年第8期撰文指出,社会企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目标优先,并采取市场运作方式来实现社会目标。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重要形态,社会企业正在从经济体系的企业群体边缘走向中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企业是与市场经济体系有内在相容性和机理逻辑自洽性的主体。真正理解社会企业的机理逻辑和观念,才能透彻认识现实世界中的市场经济。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在其事业发展及个人生涯的一定时期,往往会产生兴办社会企业的创新愿望。社会企业精神具有锐意求进的积极创新旨向,可以体现优秀企业家的终身抱负意愿。许多经济问题,本质上也是社会问题,需要以亲社会的方式来应对和解决。社会企业精神不仅仅是伦理规范,而且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亲社会性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素质。

马克思三形态理论视域下的美学经济探析

孙舒景在《云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撰文指出,三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人解放的历史逻辑及最终趋向的集中阐述,它强调人的存在状态、人的发展和解放与社会现实经济生活的紧密结合。社会的三种形态和人的三个阶段表明了人的发展解放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历程,经济生活状态是人发展解放程度的主要标尺。三形态理论视域下,美学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学经济一方面确实带来了公众生活的便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和他人的发展,证明了三形态理论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符合现实;另一方面,美学经济并非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无法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在以人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美学经济是社会主义推动人全面自由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开辟着现实的道路。

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楚向红在《河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撰文指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更关乎人类的长远发展。为此,人类必须树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面对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挑战,中国发出了最强声音,呼吁国际社会要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维护好生命金字塔平衡,坚持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和谐共处;树立自然价值观,确保生物自然权利;优化改善生物圈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坚持多边主义,增进生物多样性国际交流合作;坚持以生态文明理论为引领,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近年来,中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措施,全面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保护和提升生物多样性、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